

# 论美国新种族隔离现象

刘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 要:** 美国新种族隔离现象是在平权运动之后产生的更为隐性的种族歧视和排外行为,被称为“吉姆·克劳法”的再现。美国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饱受不公正待遇,从而使得美国社会分化更为严重。这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运转、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破坏了美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这种受历史原因、“白人至上”和现实因素推动的现象难以根除,但是,切实增进少数族裔权利、合理解决族际间的矛盾仍然是缓解种族问题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新种族主义; 种族隔离; 少数族裔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18)06-0017-06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18.06.005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平权运动后,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看似进入了更加自由平等与包容的时代,但是,种族主义并没有在美国销声匿迹,而是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这表现在美国少数族裔政治、社会、文化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的新种族隔离的表现形式或许更加隐蔽,但其对美国社会的危害程度却不亚于美国之前的显性隔离政策。在全球化受到挑战、难民危机持久存在、“美国优先”政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的新种族隔离或将对美国产生腐蚀性影响,而种族主义及排外主义情绪也会增加美国行为的不确定性。

## 一、“新吉姆·克劳法”出现

美国的种族界定自建国以来发生了若干变化,1790年只分为三类:白人、奴隶和印第安人,而到现在,尽管拉美裔人口在增加,但是美国的人种将较为长久地稳定于六类人种中,它们分别是: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亚裔、黑人或非洲黑人、拉美裔、土著夏威夷人或其他太平洋岛国居民、白人<sup>[1]</sup>。这些不同族裔在长久的历史互动中已经形成分层。黑人是被强行带到美国的唯一种

族,经历了悲惨的被奴役命运后,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后获得了自由,但其权利仍被桎梏。1876年,还在重建时期的南方各州陆续通过吉姆·克劳法,以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在所谓的“隔离但平等”的精神下,美国很多州在公共场合进行种族隔离,这使得黑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当弱势,无法获得相应的权利。这种隔离制度直到1965年才在民权运动兴起的大背景下被废除。

然而,上百年已经过去,美国依旧是一个不平等的民主国家,美国的很多东西都在变,但有很多东西仍然保持原样。虽然当今的美国人已经不再公然使用肤色来作为歧视和排外的依据,但美国依旧在司法系统对有色人种不合比例地贴上有罪的标签:对罪犯(尤其是黑人)的歧视犹如当年对黑人的歧视一样是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只要是被判为重罪,罪犯就会在就业、住房、选举、教育、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受到必然的不平等待遇,因此,美国人并没有消除吉姆·克劳法,没有终止美国的种族制度,而是重新设计了新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或许就像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杜·博伊斯(W. E. B. Du Bois)所说的那样:奴隶获得了自由;

收稿日期:2018-09-11

作者简介:刘一(1988-),男,山东济宁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美欧政治、文化与社会研究。

在阳光底下稍站片刻;便又重回奴隶制。因此,在美国社会形成了对少数族裔和穷困工薪阶层的新的歧视,这突出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种新的种族主义,“它存在于去殖民化时代……是一个单一政治空间内的人类分割状态”<sup>[2]</sup>。在如此的政治社会风貌下,被米歇尔·亚历山大称为“新吉姆·克劳法”的隔离制度已经形成<sup>[3]</sup>。美国当下的新种族隔离现象就是指在平权运动之后形成的更加隐性的难以根除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

## 二、美国新种族隔离的表现形式

美国的新种族主义和新种族主义隔离政策体现在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尤其突出,其对美国社会构成的隔阂越来越深。

在政治上,少数族裔依旧得不到应有的权利,这突出表现在少数族裔行使选举权的相关问题上。1965年,在民权运动的大背景下,为了保障宪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精神得以实现,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在8月份签署了“选举法案”(Voting Rights Act),这本身是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立法里程碑,以至于在2013年约翰·罗伯特大法官曾表示公开的歧视已经不存在。但是,被理查德·万利(Richard Valley)称作“第二次重建”的“选举法案”的签署虽然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族裔受歧视的状态,但并没有消除之。如今,美国对选民的身份、市民状态、有否犯罪等依旧进行着严格的审查,少数族裔和白人的权利仍存有巨大区别。有数据显示,从1972年到2000年,黑人在政策产出方面依旧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有色人种在选举产生的官职方面依旧未能充分代表,例如,有12%的非裔美国人是可投票的,但是他们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比例分别是10%和2%;有11%的拉美人可投票,但是其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比例仅为7%和4%;而占3.8%的可投票人数的亚裔美国人在参众两院的分别是2%和1%<sup>[4]</sup>。诚然,“选举法案”扩大了少数族裔的权利,但是他们却没有被充分代表,名实不符,无法完全行使权力。白人和少数族裔存有实际隔阂。

在经济上,少数族裔的经济水平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美国的各个种族都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种族歧视对美国各种族的收入也会有影响,虽然有的种族(如犹太人、德裔等)高于美国平均水平,但墨西哥裔、黑人和印第安人等种族显著低于美国平均水平,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平均家庭收入指数为100,墨西哥裔就是76,黑人是62,而印第安人仅为60,差别巨大<sup>[5]</sup>。虽然在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出现中产阶级增多,但是,长期形成的对抗美国白人的文化使得黑人与主流社会隔绝,这不利于其解决贫困问题,并且使得白人与黑人的隔离状态更加固化<sup>[6]</sup><sup>19</sup>。美国虽然在整体保持富裕状态,但在过去的30年中,不平等现象在经济领域逐步展现并且愈发明显,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起,很多黑人移居到芝加哥、纽约和底特律等城市,但是,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这些人逐步失去了工作,不仅仅生活贫困,而且还诱发犯罪<sup>[7]</sup>。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等少数族群的经济水平并没有随着平权运动的展开而有实质性的提升,其与白人的差距依旧巨大且持续增加。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状况尤为明显。

在社会生活中,少数族裔依旧遭受着更加隐形的歧视,教育领域便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少数族裔的孩童在美国的收容和规训中心呈现不合比例的多数,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儿童,相较于更多白人进入青少年拘留所或成人监狱,一旦进入这种规训系统,少数族裔的孩子出来后鲜有机会能够进入正常的教育系统,其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大幅减少,而且,社会本身对这种长期存在的情况并不重视,这使得很多少数族裔的孩子在幼年时代便失去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sup>[8]</sup>。美国不仅是在幼儿及青年教育中存有歧视,就是在本应秉承自由、开放和平等精神的大学教育中,依旧存有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美国平权运动之后,很多高校有倾向性地调整高校录取人数的比例,相应地提高了某些少数族裔的录取比例,但是,近期发生的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中,亚裔因为需要较白人、非裔和拉美裔更高的录取分而承担更大的入学压力而谴责哈佛长期存在的招生歧视现象。作为临时性举措的“肯定性行动”,在教育领域对

长期处于积弱地位的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进行额外照顾,但是,却因为由此而来的“逆向歧视”问题恶化了白人和黑人的关系,也在哈佛案中恶化了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照顾长期受压迫种族的权益,一方面要面对不论肤色录取的压力,还要面对不同种族间的协调问题,哈佛案或成为影响美国教育及种族关系的里程碑式案件。但是,种族歧视问题肯定将长期存在并将持续发酵。

上述新种族主义与新种族隔离政策的表现形式只是美国对少数族裔进行歧视和排斥的冰山一角,新的种族隔离展布在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在美国的公共领域常见,更是深入到人心,形成了不可消除的深刻社会建构。新的种族隔离措施如毛细血管般侵入社会机体,若控制不好,便会对社会产生毒害作用。新的种族主义更加隐晦、更具象征性、更加细微、更加“巧言令色”,相较于吉姆·克劳法施行时期,显露出了危机浸淫的底色,对于美国实则产生更大的危害。

### 三、美国产生新种族主义与新种族主义隔离政策的原因

美国反复无常、无法根本消除的种族主义当然有着其悠久且顽劣的历史原因,从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的土地开始,对土著印第安人的虐杀就开启了不同种族间的斗争史。之后,美洲大陆开始进行了罪恶的黑人贸易,把大量的黑人从非洲运往美国。黑人只是奴隶,没有相应的权利,即使在南北战争之后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并进行大规模重建之后,黑人依旧无法保障其权利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即使在民权运动之后,虽然黑人和其他族裔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提升,但是仍旧无法获得像白人一样的政治权益。因此,历史对于种族主义和隔离政策的出现提供了有益注脚,美国社会也普遍意识到历史中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的残忍对待是不道义的,所以,美国人在平权运动后给予了少数族裔更多的关心。但是,若要理解新种族隔离产生的原因,就不仅要找历史原因,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综合分析。

美国长期存在的“白人优越”论。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认为,种族的偏见可能与

已知的历史同样悠久,历史学家乔尔·科维尔指出,种族仇恨存于人的本性之中,种族主义表现为种族中心论的态度、趋势和行为,人类把自身与“他者”对立,把“文明人”与“野蛮人”对立,对立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敌意,某种群体具有“选择优势”,以在生存环境中获利<sup>[9]2-6</sup>。因为美国具有长期统治压迫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罪恶历史,这就使得美国形成了自大心理并存有种族偏见。斯宾塞在1882年访美时表示,美国“雅利安”各族人口的融合将产生最强有力的人并创造最为灿烂的文明,美国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和优等民族论逐渐被用于美国排斥新移民、加深对其他种族歧视的趋势中<sup>[10]</sup>。伴随着欧洲海外殖民发展而来的白人种族优越意识在美国带有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特征,美国人曾经表示美利坚民族是融合了各族优点的崭新民族,美国政体独一无二,以此形成美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美国例外”,但是,“美国例外”指涉自由白人,所以,有了“白人优越”的种族底色<sup>[11]</sup>。在美国的社会中,种族不仅用来分类,还可以为美国建构出一道区分彼此的身份边界,这个边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互动中已经明晰深刻,新的种族主义在当今美国可以逃离对肤色和种族的框定,但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美国白人优越论这个最具歧视色彩的词汇。如今的“美国优先”和“美国第一”等宣传词汇,一定程度上指涉“白人优先”和“白人第一”,以此形成美国国内和国际政策思想和行为逻辑。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和“肯定性行动”的滥觞。为了应对移民增多和比例变化的问题,美国逐步地由之前的“熔炉”政策变成强调尊重多元文化主义以更好地进行民族融合。美国的“熔炉”政策是希望通过各种相关手段对不同种族进行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建构,而不管这个种族的来源、宗教、族群或生活习惯,以此形成坚定的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然而,“熔炉”政策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美国族群间的问题,伴随着民权运动、少数族裔比例的变化,美国逐步开始推行多元文化主义,这就强调了各个种族、群体的平等地位,表达了人类社会不同文化群体相互平等且一种文化不会低于另一文化的普遍价值观<sup>[12]</sup>。作为

解决长久积弊的“肯定性行动”,或许就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进行实践的一种具体政策,其根本目的是在较短时期内结束对少数群体的照顾性措施并使得真正遭到不公的人群成为美国社会的平等一员,但是,这种措施侵犯了白人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男性权益,他们指责“肯定性行动”违反机会平等原则、侵害了个人自由,这种思想最终融入西方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潮之中<sup>[6]20-21</sup>。除非多元文化主义提出新的更高的政治理想,否则其效力会减弱甚或成为阻力<sup>[13]</sup>。所以,这种对文化多元主义和“肯定性行动”的强调,一定程度上使得白人这种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感觉受到了“逆向歧视”,并且使得主流白人群体和少数族裔之间因此产生了越发明显的身份边界,双方始终无法脱离关系恶化的泥淖。此外,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使得少数族裔融入美国社会大家庭,反而是成为不作为的工具和逃避责任的借口,外来人口、弱势族裔和主流社会无法融入,并且使得双方的差异更加僵化,多元文化主义的替代品没有出现以至于使得民族国家和传统主导文化的结合成为现实归宿:欧洲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宣称这种融合路径已经行不通,而美国所谓的“美国优先”等理念也表明民族国家成为种族主义者的认同载体。当今西方世界呈现出了保守主义趋势,这种失败的融合政策无疑增加了白人主流社会和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隔阂,新种族主义和新种族隔离无疑离不开这种传统保守主义回归的背景。

新种族隔离政策的当前动因。历史中形成的难以消除的顽劣积弊、白人种族优越带来的美国例外、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消极影响构成了美国社会新种族主义产生的晦暗底色,而美国在当前实行新的种族隔离行径有了更加宏大的时空背景。奥巴马上台后,西方社会曾经乐观地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后种族时代”,以此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可能替代<sup>[14]</sup>。然而,奥巴马的平权目标并未实现,还引起了白人保守主义的反弹<sup>[15]</sup>。欧洲自二战后空前的难民危机、“逆向歧视”和民粹主义运动,为当前的种族主义提供了借尸还魂的“有利”环境,这种最丑恶的区分所谓“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的新种族主义在西方社会不断上

演<sup>[16]</sup>。如今,特朗普的上任被有的学者夸张地称为“是对过去法西斯主义的遥相呼应”,并表示贴了反移民、反穆斯林、种族族裔和反妇女标签的特朗普执掌权力后,把种族主义变成政府统治的意识形态上的有力“恐怖”武器,以对黑人为主的少数弱势族裔进行宣战。特朗普政府发动了一场美国社会内的“战争”,以此来展示美国的基督教“白人至上”和百年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精英治理理念<sup>[17]</sup>。特朗普在竞选中,就利用了民粹主义在美国兴起的有利条件来为自己造势。他入住白宫后,其移民和种族政策的实施使得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特朗普上台后就签署了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限穆令”,在其执政期间对“白人至上”的种族运动持宽容态度,对移民进行严格的限制,采取毫不包容的政策,对墨西哥人儿童和父母分别的情况视而不见,侵犯了人权。而特朗普执政期间,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美墨边境安全墙的修建,特朗普打破了原来的政治忌讳,将安全栅栏直接称为“墙”,以此来彰显其边界“柏林墙”般的阴森色彩。特朗普还表示,因为墨西哥人不把最好的人输送到美国,所以,要修建这堵隔离墙。这样,象征意义极为明显的边境墙不仅恶化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还加深了白人与墨西哥裔美国人与拉美移民的隔阂,是美国新种族隔离政策的最生动体现。边境墙不仅仅在美墨边境线上,还在美国人心中。

总之,新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出现以及新种族隔离政策隐秘实施,离不开美国罪恶的奴役少数族裔的顽劣历史,这为理解美国当今的种族主义提供了广阔的时空注脚。“白人优越论”以及“美国例外论”为白人歧视他者的种族主义提供了拙劣的“理论”基础,而熔炉政策失效后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肯定性行动”带来的负面效应从反向增加了白人的不公平感,期望重新“夺回”属于他们的权利。最后,新种族主义在后奥巴马时代被迫反弹,使得特朗普能利用白人的不满赢得选举并在入住白宫后执意实行其歧视性种族政策,这不仅分化了美国社会,还使得以“白人至上”为根的“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等理念在国际上肆行,增加了美国行为的不确定性,以至于美墨边境墙成为地理与象征意义上的

种族隔离墙。

#### 四、新种族隔离主义产生的影响

新种族主义和新种族隔离政策将会更加深刻地分化美国社会。虽然在当今的美国尊重少数族裔的权利、促进公平自由、维护司法公正、禁止种族歧视是自平权运动后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但是隐性的种族隔离措施或更加深刻地分化和影响美国社会。“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是象征性的、微妙的和间接的种族主义,以关心‘文化’上的道貌岸然,玩弄隐喻来歪曲和颠倒所使用的‘美丽词语’。”<sup>[19]</sup><sup>56</sup>相较于显性歧视,隐性的新种族隔离政策本质上依旧是种族歧视和排斥主义,依旧含有“白人至上”和“白人优先”的理念。因为在政治选举、住房空间隔离、经济分配、教育、司法、治安等领域的歧视性或不公正待遇,少数弱势族裔和上层精英社会的差距逐渐扩大。新种族隔离使得原本已经分层的美国社会更加极化,富裕有权阶层获利更多,而少数族裔则形成结构性的积弱状态,不同阶层的壁垒被建构得更加明晰,边界无法跨越,这就使得社会隔阂更深,全面地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政治极化现象更加严重。已故的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曾对弹劾克林顿的事情进行了引用“赞成弹劾的共和党一方,是清一色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几乎全部来自南方,除一人外全部是男性。反对弹劾的民主党一方,有天主教徒,犹太人,黑人,妇女,一名同性恋者,一名来自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男性白人。”<sup>[18]</sup>以拉美裔为例,有准确的研究显示,除了古巴之外的大部分拉美裔已经认定并将持续认为自己支持民主党,具体来说,墨西哥裔保持稳定,古巴裔更倾向于共和党,中美洲人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此外,外来移民也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sup>[19]</sup>。这样,一方面,白人依旧是较为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少数族裔依旧是民主党支持者。特朗普上台后,逐步地销蚀奥巴马留下的政治遗产,也越发坚定地执行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政策。无疑,现今的新种族隔离政策肯定会促使保守阵营和自由阵营的隔阂更加僵化,这就可能提高政治竞争的激烈程度,降低国会效率,使得共和党和

民主党无法在相关问题上获得和解,产生了“否决政治”<sup>[20]</sup>。

国际上的不良影响。新种族主义与新种族隔离政策会在国际上产生两方面的消极影响,第一个是损害美国的国家形象,消减美国的软实力。一方面是恶化美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美国长期宣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民主的灯塔”,是“山巅之城”,美国理应代表着最先进、最平等、最自由、最包容的思想。可是,美国历史上的显性种族隔离的丑恶历史和当今“吉姆·克劳法”的隐性再现,使得美国所一直崇尚的价值观失去张力。特朗普上台之后,愈发显著的种族保守主义倾向也使得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美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美国人的新种族主义继续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表示,种族歧视强有力地形成了国家对付其他民族的方法;小马丁·路德·金也认为,除非美国施行没有种族歧视的对外政策,否则世界是没有和平的。这些话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sup>[21]</sup>。不论是特朗普的“限穆令”,还是美墨边境安全墙,都从根本上展示了美国白人精英的种族主义价值观。新种族主义和新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逐步地销蚀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并且很容易恶化美国的国际环境,树敌众多,不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 五、结语

熔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之后的美国,理应进入后种族和后现代的白人与少数族裔的相处模式,即在考量某个人时,应该看其做了什么,而不应该关注其出身和肤色等因素。例如,在思考奥巴马时,人们应该更多地讨论其作为美国总统给国家留下了什么,有何政治遗产,等等。而不是过分地讨论其出身,以及作为一个黑人总统给国家或者黑人社会带来了什么。如果更进一步,用福柯的话语去理解种族主义,就需要考虑到如何在一个生命政治实体的国家促进个人的生产性,而不是像传统的主权国家那样侧重于管理死亡。因此,既然在短期内无法消除种族主义产生的根源,也无法对已经形成历史惯性的种族政策

进行优化,就需要在社会治理和管理的过程中切实给予少数弱势族裔合理的权利,但同时,也需要照顾不同少数族裔间权利的平衡比例分配问题,还要兼顾主流白人社会的合理诉求。所以,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让少数弱势族裔获得生产性权利,切实提高生活水平,增进政治参与,逐步地获得参与感并增加族际间的沟通,才可能让新形态的种族主义壁垒逐渐消融,而这种对人身价值的实现与侧重,在特朗普把国家和种族主义重新结合的硬主权时代就会显得弥足珍贵。

#### 参考文献:

- [1] Hogan, Howard, Race: Changing Composition, Changing Definition, Race in America: Restructuring Inequality, Intergroup Race Relations Report, The Third of Seven Reports on the Race in America Conference June 3 - 6 2010.
- [2] Balibar, Etienne and Wallerstein, Immanuel, Race, Nation, Class [M]. Verso, London New York, 1992, 21.
- [3] Alexander, Michelle,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M]. the New Press, New York, 2011.
- [4] Brown, Dean, Khalilah, 50 YEARS OF THE VOTING RIGHTS ACT, The State of Race in Politics. <https://jointcenter.org/content/50-years-voting-rights-act-state-race-politics>.
- [5] [美]托马斯·索威尔. 美国种族简史 [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5: 6.
- [6] 胡锦涛. 美国白人种族主义与“逆向歧视” [J]. 世界民族, 2008, (3).
- [7] [美]弗朗西斯·福山. 反对身份政治: 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 [N/OL].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9734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97349).
- [8] Marrus, Ellen, Education in Black America: Is It the New Jim Crow? [J] ARKANSAS LAW REVIEW, 2015, (27): 27 - 54.
- [9]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基耶夫. 种族主义源流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 [10] 罗凤礼. 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J]. 世界历史, 1986, (4): 19 - 27.
- [11] 伍斌. “种族”界定与美国对东南欧移民的排斥 (1880 - 1924) [J]. 历史研究, 2015, (2): 111.
- [12] 王恩铭. 也谈美国多元文化主义 [J]. 国际观察, 2005, (4): 10 - 19.
- [13] 王希. 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 [J]. 美国研究, 2000, (2): 76.
- [14] Lentin, Alana, Post - Race, Post Politics: The paradoxical rise of culture after multiculturalism [J]. Ethnic & Racial Studies, 2014, 37(8): 1268 - 1285.
- [15] 何晓跃. 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 特征、成因及影响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 (3): 109.
- [16] 王义桅. 欧美种族主义何去何从 [J]. 人民论坛, 2018, (5): 22.
- [17] Giroux, Henry A, White nationalism, armed culture and state violence in the age of Donald Trump [J],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7, 43(9): 887 - 910.
- [18]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Clinton Impeachment.” Online Commentary, No. 10, Feb 15, 1999, <http://fbc.binghamton.edu/10en.htm>. (转引自: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256).
- [19] De La Garza, Rodolfo, LATINO POLITICS [J]. Annu. Rev. Polit. Sci. 2004, (7): 104 - 105.
- [20] 节大磊. 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 [J]. 美国研究, 2016, (2): 61 - 74.
- [21] 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 [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 268 - 282.

[责任编辑 都永浩]